



新常态下的重庆 发展动力研究

XIN CHANGTAI XIA DE CHONGQING
FAZHAN DONGLI YANJIU

新常态下的重庆发展动力研究*

(2016年5月)

“十三五”是新旧交替、新旧转换的关键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由注重规模速度的粗放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重。要适应经济增长减速、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换和多重风险挑战并存这样一种新的变化,关键要抓住新常态下动力转换的“牛鼻子”。第一,应当认清“十三五”时期,重庆将呈现由传统动力和新兴动力共同组成的混合动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第二,需求侧和供给侧双向发力将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第三,要加快培育口岸经济等新生动力,构建发展新引擎;第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攻坚克难,释放发展动力,助推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重庆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分析

(一)重庆新常态的全国共性

“新常态”是相对于“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而言的,“新”体现了不同

*课题指导:童小平、易小光;课题组长:丁瑶;课题组副组长:严晓光;主研人员:王秀模、尹虹潘、邓兰燕、李丹妮、罗宇航、陈殊、邓吉敏、张佳、张超;联络员:杨婷、李丹妮。

时期节点的划分,而“常态”是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时期。

1.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基本特征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述,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逻辑。经济新常态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性特征。

传统动力调整压力与增长空间并存,经济需求侧动力正在调整变化。一是消费需求趋向个性化、多元化,继续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我国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进入了以个性化、多样化为主流的消费阶段,消费层次也进一步细分。这要求政策思路转向更多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二是投资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目前传统产业相对饱和,房地产投资呈现减速趋势,但新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公共性强的基础设施、技术和产品创新领域的投资机会很多。当然由于其或投资回报偏低或投资风险较大,对投融资方式创新提出新的要求。三是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但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发生转化。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总需求不振,虽然出口对我国经济支撑作用依然十分重要,但传统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发生趋势性改变,亟需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资金和对外投资这三大平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孕育新动能。一是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正成为政策着力点。过去通过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就能形成有效增长,现在国内外市场已无法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所以必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现阶段呈现的是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同步发生,在“互联网+”背景下,政策着力点要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生

产相对集中和产业组织创新。二是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逐渐增强,今后要更多依靠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传统的要素投入方式。三是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深化。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将成为主流,过去在供给短缺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情况下,市场竞争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深化改革开放,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

提高质量效益和防控风险成为新的政策着力点。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不断降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需求迫切。过去水、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以及环境承载空间相对是比较大的,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政策着力点需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二是各类风险不断积累并逐步显性化,化解风险的体制机制趋向完善。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虽然目前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还需要一段时间,今后政策要对症下药,坚决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三是宏观调控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趋向差异化、市场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需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市场机制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2.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探析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由注重规模速度的粗放增长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重,发展动力由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等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究其原因,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主观上我国趋向于追



求生产发展方式转变为发展留下更大调整空间,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客观上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全球进入深度调整期。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严重,出口动力疲软。二是传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进而推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但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制约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抑制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增长不足,抑制消费需求。三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劳动投入、资本形成、科技进步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低成本无限供给以及资本投入的规模扩张,但目前劳动力、资本的供给效率均在下降,全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持续下降。四是科技创新能力滞后。过去我国主要是在技术引进、扩散、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目前全球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期,以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硬件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加快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五是资源环境硬约束加剧。碳排放、雾霾、饮用水污染、重金属超标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生产形成硬约束,国际国内的要求和压力显著加大。

3.重庆经济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系

在新的国际国内宏观环境背景下,作为全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重庆的新常态同时具备“全国共性”和“重庆特性”。一方面,重庆与全国一道进入了发展新常态,与全国一样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新常态下的一些共性矛盾和问题,诸如潜在增长率下降、动力结构单一、资源要素约束加剧、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等。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运行可能呈现“L”形走势。另一方面,重庆作为全国四个直辖市之一,在新的历史阶段,国家赋

予其“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①“西部中心枢纽”^②新的战略定位,立足当前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新常态发展,仍将大有可为。由于其承担的历史任务要求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特殊性,就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加快研究在增速换挡、规模转型、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下如何寻求新的动力推动重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真正做到“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的状态。

(二)重庆新常态下的鲜明特征

1. 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当前重庆正处在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破除体制机制矛盾的关键节点,加强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较大。

一是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平看,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潜力较大。当前重庆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发展阶段,而全国工业化进程已整体进入中后期阶段^③,重庆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全国,在新的发展时期下,集聚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较大。同时,重庆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相对较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推进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城镇化,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和消费需求,为重庆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① 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对重庆的定位。

②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中对重庆的定位。

③ 易小光等.“四化”同步发展与区域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二是从“双欠”的基本市情看,经济发展仍有较大回旋余地。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总体上仍处于欠发达阶段、属于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市情没有根本变化,城乡、区域二元矛盾突出,统筹协调发展任务繁重。近年来,重庆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在由“双欠”向中等收入发展水平转化、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仍具备较大潜力和回旋余地。

三是从劳动力要素供给看,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相较于全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减弱,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依然突出。当前重庆城镇化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且随着农民工回流速度加快以及城市对周边地区人口的聚集吸引力逐步增强,后期人口红利释放空间依然较大。同时,当前较为粗放的人力资源使用方式将得到转变,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升,也将促进人口红利进一步释放。

2. 结构动力的特殊性

当前重庆经济运行处于直辖以来第四轮短期波动的回落阶段,过去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需求动力正在逐步减弱,新的动力尚在培育之中。在新常态背景下,投资、消费和出口动力虽与全国同步遭遇瓶颈,但由于基础水平较低,后期发展空间仍相对较大。

一是投资增速逐步放缓,但内在结构性动力依然较强。高投资一直是重庆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但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基建、工业和房地产三大投资需求主力均受到制约,投资增长呈现出与全国一致的放缓趋势。但由于重庆基础设施在交通、农业农村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仍存在较多薄弱环节,后期仍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空间,经济开发区和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产业投资仍大有可为,总体上看,重庆投资保持增长、投资效率提升的潜力仍然较大。

二是消费贡献率相对偏低,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具备条件。当前消费已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最终消费贡献率达到了66.4%,而重庆的消费贡献率维持在42%左右的相对偏低水平,仍未对经济增长形成主要支撑,网络零售额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是重庆消费与全国一样,都正处于增长的上升期,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倒逼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新的消费模式和新兴消费业态将推动消费增长提速。近年来重庆GDP的较快增长也将提升居民收入预期,后期消费增长仍大有空间。

三是传统出口动力受到抑制,口岸经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与全国对外贸易形势一样,受国际市场需求疲弱以及区域竞争加大的影响,重庆贸易出口、外资引入均受到抑制,外向型产业结构、产品面临的压力较大,传统的出口增长动力已难以为继。但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功能的加快发挥以及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的有序推进,重庆在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集聚全球各类要素资源等方面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口岸经济将成为重庆最主要的后发优势,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是科技创新明显不足,后期具备较大提升空间。由于缺乏高水平的科研机构、高校和国家级实验室,高端研发人才总量偏少,有助于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高新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较为缺乏。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偏小,除长安集团外有实力加大研发投入的企业不多,导致重庆科技创新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明显不足,创新发展动力依然偏弱。当前重庆劳动生产率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研投入中R&D经费占GDP比重仅为1.5,不仅低于全国,也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但随着重庆加快打造西部创新中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也将成为重庆的后发优势,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发展机遇的特殊性

“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与大变革的进程中,我国仍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进入新常态。重庆特殊的战略节点条件,以及前期市内产业优化升级取得



的良好成果,为重庆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和内部支撑。

一是国家战略地位聚焦,赋予重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战略在全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以及成渝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开放战略深入推进,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产业腹地、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的功能和作用将日趋凸显,有利于重庆在更大范围内扩大开放、深化协作、配置资源。

二是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有利于重庆积极融入全国区域发展开放格局。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中心城市,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连接点、国家向西开放与沿江开放结合点,在全国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和开放格局中,依托区位优势,重庆有望成为我国向西、向南开放的陆路大通道和主要口岸,面临由内陆后方跃升为开放前沿的重大发展机遇。

三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有序推进,将极大提升重庆对外开放水平。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将极大提升重庆的中心枢纽和集聚辐射功能,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汇集的同时,将有利于重庆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资本转移,助推口岸经济发展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中新项目将为重庆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四是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推动区域发展潜力不断释放。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作为重庆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载体和平台,在促进全市各功能板块之间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将推动各功能板块差异化、特色化协调联动发展的潜力不断释放,促进区域产业空间拓展和城市功能提升。

五是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有助于重庆发展更上台阶。直辖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以来,重庆加快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前瞻性布局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新的工业增长极,推动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加快集聚发展,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开放平台更趋完善,开放型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提速,城市环境和功能更趋优化。整体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有助于重庆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进一步激发产业、业态、模式创新等后发优势,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为下一阶段的跨越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国内外相关理论对增长动力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作为生产力现代形式的工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推动发展的决定力量。

科学技术创新是生产力变革的重要动力。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

^① 王令金,李元峰,张详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及导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提高”^①。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优劣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③。“主导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④。

劳动创造价值,也创造了文明进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即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属性,并进一步指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西方经济学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邓小平指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终结果归结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表明,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劳动的目标。习近平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⑤。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为劳动者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物质基础。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4-06-04.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⑤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29.

(二)国内外相关增长理论

凯恩斯“消费和投资”稳增长认识论。凯恩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也会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在有效需求不足时,应当由政府采取扩大消费和投资的刺激需求措施来稳定增长和达到充分就业,需求能创造出自己的供给,使生产(供给)增加。一是采取逆经济风向的政策,斟酌使用紧缩或扩张的政策,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以职能财政为目标,通过灵活的财政政策安排,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中的关键作用。从实践来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在短期内对保持经济稳定具有很大作用,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国家干预政策不能解决生产要素质量和结构的矛盾,从而难以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矛盾。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可以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的极限。资本积累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受资本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资本积累的动力逐渐减弱。哈罗德-多马模型研究了投资率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索罗模型研究了在稳态经济增长条件下,技术进步产生的经济增长动力。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罗默和卢卡斯研究了在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研究认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既改善了资本,又促进了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产业模式创新等创新活动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熊彼特创新理论及熊彼特学派认为,经济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有着重要联系,“破坏性创新”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变,进而推动经济走向新的繁荣。

供给学派的增长理论。供给学派相信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供给管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萨伊认为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也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相等。储蓄和投资是



生产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投资规模决定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因此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凡劳动和资本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具有较高储蓄比率和投资比率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通常都较快。低税率有利于积累资本、刺激供给和增长国民收入。供给学派认为,企业与个人的经济活动取决于税率刺激的吸引力,拉弗曲线表明了边际税率的高低影响投资积极性。

生产力布局理论。相关理论认为,生产力诸要素在区域空间的配置和组合,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增长极对周边区域经济活动有支配效应。对占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和区域投资可以有效利用增长极的创新来增加产出,扩大有效需求,由此带来的规模经济反过来又刺激创新,这种机制通过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带动周边发展。产业梯度理论认为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梯度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中低梯度地区转移,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区域均衡增长和非均衡增长都影响经济结构转变。均衡增长理论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产业、均衡投资,各地齐头并进,最终实现整体均衡发展。结构主义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强调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强调实现重点区域的突破。

三、立足重庆新常态培育强劲发展动力

未来一个时期,重庆市将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格局,全面深化和拓展全市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统筹投资、消费、区域净流出“三驾马车”改善需求动力,统筹三次产业发展增强结构动力,统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发展培育新生动力,统筹经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生动力,同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活

力,将新旧动力有机融合在一起,着力构建新常态下的强劲混合发展动力(见图1-1)。



图 1-1 重庆新常态下发展动力结构示意图

(一)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崇尚创新,注入内生发展动力。国家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庆也应该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创新人才和创新要素集聚。着力优化创新制度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构建多层次的创新融资保障渠道,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加大科研成果孵化和产业化转化的市场培育力度。重点以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基础创新主体,以企业为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应用创新主体,真正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体系。围绕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积极争取关键技术突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注重协调,各个领域协同共进。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深化城乡户籍、土地、金融、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领域的



制度改革,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新局面。促进五大功能区域在全市赋予的战略定位下进行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既突出不同功能区域的侧重领域和发展重点,又形成各功能区域互动互补的全市“一盘棋”发展格局。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共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使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从空间上和功能上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引导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倡导绿色,促进长期持续发展。在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推动全市绿色发展。都市功能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发展高端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生产、生活的绿色化。城市发展新区全面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重点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着力减少单位产出物质消耗,并大力引导城乡居民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立足“大旅游经济”思路,在保护中促进绿色发展,在绿色发展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厚植开放,增强内陆发展活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智力、资本和市场的深度作用,共同创造和分享国际创新成果。国家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向东向西开放,通过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重庆应立足其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有利区位,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高标准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好中国(重庆)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发挥水运、航空、铁路枢纽作用,通过“三合一”开放平台体系和信息开放枢纽的叠加优势,完善水陆空及信息的立体开放大通道体系,促进全市口岸经济大发展;重点通过以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保税(港)区、保税物流园区、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等产业平台形成口岸经济腹地,使口岸经济成为推动重庆市“十三五”时期快速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

推进共享,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共享”理念实现的程度,将决定“有效需求”的增长水平。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以相关国家级和市级贫困区县(自治县)为重点区域、以建卡贫困人口为重点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坚持精准扶贫和脱贫,立足不同贫困区县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着力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在2017年前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促进就业创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促进全市人口均衡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适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供给,优化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着力提高服务和保障水平,使全市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转变方式抓好统筹构建混合动力

“十三五”时期对于重庆而言,传统增长动力虽已遭遇瓶颈并逐步减弱,但仍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经济结构变化及发展转型所蕴含的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拓展全球新兴市场和需求必将为全市“十三五”经济增长带来新亮点、新支撑和新动力,但这些动力还需要经历一个培育的过程。在新常态下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培育应该遵循全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构成规律,着眼于统筹优化影响发展的各层面、各方面因素,着力于将新兴动力与常规动力有机结合,形成混合发展动力。

因此,我们既迫切需要尽快壮大新兴增长动力,也仍然需要传统动力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新老动力同时发力,形成混合动力,共同支撑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提高有效投资,发挥其对短期稳增长、长期调结构的双重功能;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培育新兴消费增长点;巩固提升出口的促进作用,增强内陆开放经济发展活力。二是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改善和提升生